

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 “吃”“喝”类动词研究*

贾燕子

吴福祥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借鉴词汇类型学的理论框架和已有成果,从定名学、符意学以及词汇和语法互动三个方面,考察汉语“吃”“喝”概念的词汇化和范畴化、“吃”“喝”类动词的多义性及其所具有的形态句法特征,并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探求汉语“吃”“喝”类动词在历时演变及共时分布中所呈现的共性倾向和个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显示,汉语“吃”“喝”类动词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多种表现都具有一定的跨语言共性。由此可见,词汇现象表面上纷繁复杂,其背后却有一定的系统性。

关键词 词汇类型学 汉语“吃”“喝”类动词 定名学 符意学 词汇—语法互动

一 引言

吃、喝是人类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活动。多数语言中表达吃喝意义的词汇均为基本词和常用词^①，“吃”“喝”类动词因而受到语言学家的较多关注。在汉语学界,刘复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过《释“吃”》一文,讨论汉语“吃”古今南北用法的差异及其多义性。此后,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语的“吃”“喝”类动词进行了研究,如崔宰荣(2001)、杜翔(2002)、尹戴忠(2011)等对“吃喝”概念场历史演变的描写;吕传峰(2006)、张蔚虹(2010)、贾燕子(2013)等对“吃”“喝”类动词历时替换的考察;梁冬青(2007、2009)、平山久雄(2004)等对“吃”“喝”来源的探求;解海江和李如龙(2004)、吕传峰(2005)、陈瑶(2013)等对“吃”“喝”方言用法及演变层次的讨论;陶红印(2000)、谢晓明和左双菊(2007)、熊学亮(2009)、徐宜良(2014)等对“吃”“喝”语义特征和句法结构的分析。随着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及语法化

*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功能—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词汇通史”(14ZDB09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基本词汇历史演变研究”(16JJD740015)的资助。《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① 如典型的阿姆哈拉语(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动词词根都是三辅音的,而那些在话语中高频使用或者在概念上“基本”的动词却具有双辅音词根:/hd/“去”、/mt’/“来”、/k’m/“站”、/sm/“听到”、/st’/“给”,以及动词/bl/“吃”和/t’t’/“喝”。(Newman & Aberra, 2009: 254)

研究的兴起,“吃”的多义性引发了更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探索,如池昌海(1992)、董为光(1995)、熊金星和谢晓明(2006)等从文化视角对“吃”多义性与汉民族文化关系的解析;王占华(2000)、解海江(2006)、聂亚宁(2008)等从认知视角对“吃”隐喻、转喻等语义演变模式的刻画以及杨一姝(2012)、李云彤(2013)等对“吃”多义网络的建构;江蓝生(1989)、蒋绍愚和曹广顺主编(2005:392-397)等从语法化视角对“吃”表被动义、原因义等语法化过程的分析。尽管以上研究使我们对汉语“吃”“喝”类动词的历史演变脉络、方言用法差异、句法语义特征及词义扩展途径等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缺乏跨语言视角和类型学视野,以往的研究对汉语“吃”“喝”类动词演变的共性倾向和个性特征鲜有涉及。

另一方面,就我们视野所及,普通语言学界已有多位学者对特定语言中“吃”“喝”类动词进行过深入研究,如Gouffé(1966)、Williams(1991)之于豪萨语,Newman(1997)之于英语,Family(2008)之于波斯语,Pardeshi et al.(2006)之于亚洲语言,Bonvini(2008)之于尼日尔-刚果语系语言,Hénault(2008)之于印欧语系诸语言。随着词汇类型学的兴起,加拿大学者Newman(2009)组织一批语言学家专门开展了“吃”“喝”类动词的类型学研究,分别对Manambu语、日语、朝鲜语、豪萨语、阿姆哈拉语、印度-雅利安语支、阿萨巴斯卡语系诸语言的“吃”“喝”类动词进行了考察。这些成果为我们进行跨语言比较提供了极大便利。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研究多数只关注“吃”“喝”类动词的共时层面,历时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类型学是对跨语言结构规律或模式的研究(Croft, 2008: 1),其主要目的是探讨人类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所受到的严格制约,揭示纷繁复杂的语言差异背后的系统性。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历来比较关注语音和语法,而词汇的类型学研究近十余年才逐渐兴起。根据Lehrer(1992: 249)的经典定义,词汇类型学是“研究各种语言里如何将语义材料包装成词的特别方式”。其基本假设是,不同语言的词汇现象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没有规律,但通过系统的跨语言比较可以发现,语言中丰富的词汇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释和预测的。近十多年来,莫斯科词汇类型学研究小组、荷兰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语言与认知小组、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展的调研工作,使得词汇类型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目前,词汇类型学尽管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但Koch(2001)、Koptjevskaja-Tamm & Vanhove et al.(2007)、Koptjevskaja-Tamm(2008、2012)、Evans(2010)均一致主张,词汇类型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关注焦点:(i)定名学视角(onomasiological perspective),即考察某一(些)概念的词汇化和在特定概念场的切分方式;(ii)符意学视角(semasiological perspective),即考察某一(些)概念的语义关联和语义衍生;(iii)词汇和语法互动视角,即考察某一(些)概念的语法编码和句法行为。从已完成的大型词汇类型学研究项目来看,尽管不同机构所从事项目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多数都围绕以上焦点进行。

本文参照“吃”“喝”类词语的已有成果,借鉴词汇类型学的理论框架,从定名学、符意学以及词汇和语法互动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汉语“吃”“喝”类动词在历时演变及共时分布中所呈现的跨语言共性与个性特征,以尝试为汉语词汇的共时和历时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本文所用的历史材料来自中国基本古籍库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方言材料主要参考李荣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41分地卷)、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以及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

二 “吃”“喝”概念的词汇化与范畴化

本节从定名学的角度讨论“吃”“喝”概念的词汇化与范畴化方式,先考察汉语的情况,再基于跨语言材料来审视其共性倾向和个性特征。

2.1 汉语“吃”“喝”概念的词汇化与范畴化

2.1.1 汉语“吃”“喝”概念的词汇化

根据历史文献的用词情况,汉语不同时期表征“吃”“喝”概念的主导词^②如表1所示:

表1 汉语不同时期表征“吃”“喝”概念的主导词

词项 \ 时代	先秦至隋	唐至清代中叶	清末至今
“吃”类词	食	吃	吃
“喝”类词	饮		喝

先秦至隋,汉语中用于表达“吃”“喝”概念最常用的词语是“食”和“饮”。“食”的对象为固体和半流体食物。如在《十三经新索引》中,“食”的受事有“肉、粥、菜果、醢酱、果实、菽、鸡、麦、羊、麻、犬、黍”等。(解海江、李如龙,2004)“饮”的对象多是“水、清泉、玉浆、酒、茶、汤”等液体。“吃”大约产生于汉魏时期^③,唐代用例逐渐增多。至迟到晚唐五代,口语中“吃”已经取代“食”“饮”成为表达吃喝义的主导词。(贾燕子,2013)与“食”“饮”不同的是,“吃”的对象既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液体。如寒山、拾得诗中“吃”的受事有“肉、猪肠、酒、鱼、饭、糊饼”等,敦煌变文出现了“水、河水、茶、酒、琼浆”等液体。大约到元代,新出现了“喝”,用于表示以液体为受事的吃喝行为。^④不过在元明及清代前期的文献中,喝液体最常用的仍是“吃”,清中叶以后,“喝”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普通话中,“吃”表示吃食物,“喝”表示喝液体,两者成为同级词^⑤关系。

据《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的地图47“饮食动词”(岩田礼,2009:254-255),现代汉语方言中“饮食动词”的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X-X”系(A)和“X-Y”系(B),前者以同一动词表示“吃”义与“喝”义,而后者则以不同动词表示。根据动词的类别,A系又分为三类,B系分为七类。A系基本上分布于南方,B系多分布于北方,但也分布于浙江南部至广东、广西的南

② 指表征某一概念的几个词语中最常用的那个词,多具有义域广、使用频率高、句法功能强的特点。

③ 最初写作“喫”,约在宋代出现了“吃”的写法,此后两个字形长期并用。

④ “喝”另有写作“哈”“呵”“嗑”等的字形。(吕传峰,2006)

⑤ 同级词指某概念场中处于同一层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方地区。其分布的大致情况见表2^⑥：

表2 现代汉语方言表征“吃”“喝”概念主导词的分布情况

类别		分布地域
A系	“吃—吃”型	主要分布在浙江、上海等吴语区，江西北部、西部和东部的赣语区，湖南中部和东部的湘语区。
	“食—食”型	以福建为中心，也分布于浙江南部、江西南部及广东东部和西部等地区。
	“啜—啜”型	集中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的交界处，如玉山、江山、广丰、遂昌、松阳等地。
B系	“吃—喝”型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江苏西北部、陕西、青海、宁夏等的官话区，山西的晋语区及安徽东南部的徽语区。
	“吃—饮”型	主要分布在广东地区，将“食—饮”型的领域隔断。
	“食—饮”型	集中存在于广东，也散布在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安徽宿松等地。
	“食—啖”型	仅限于福建、台湾和广东。
	“食—喝”型	分散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
	“食—啜”型	零散地分布在福建、湖南、广东、海南等地区。
	“[tai]—喝”型	只出现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2.1.2 汉语“吃”“喝”概念的范畴化

我们把由“吃”“喝”概念构成的区域称为“吃喝”概念场。汉语不同历史时期“吃喝”概念场的情况见表3。

表3 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吃喝”概念场(改编自蒋绍愚, 2015:394—395)

时段	主体:人		主体:鱼、鸟	
	对象	词项	对象	词项
先秦至隋	饭	食、饭、餐、啖/啗	虫、粮、水	啜/啜
	粥、羹	啜/啜		
	水、酒	饮		
	方式	词项	方式	词项
	少吃	尝	(无)	(无)
	不咀嚼	吞、嚥(《礼记》:毋嚥羹)		
	一口吃下	嚼(《礼记》:毋嚼羹)		
	使……吃	哺/哺、啖/啗、食、萎/餽 ^⑦		

^⑥ 表2的分布地域参考《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的地图47和《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084—086。按:此表仅列出了方言中表征“吃”“喝”概念的主导词出现地域较多的情况,一些仅见于一两个方言点较为特殊的情况没有列入。如“吃”“喝”义用同一个词表示的A系中,还有西宁、岷县用“喝”,龙山用“歹”,新田、嘉禾用“叶”,江华用“[xai⁵¹]”。

^⑦ 记录“喂”字形的时间顺序大致为:萎→餽→餽→喂、偃→喂。(刘君敬, 2011:59—63)

时段	主体:人		主体:鱼、鸟	
唐至清代中叶	对象	词项	对象	词项
	饭	喫/吃、食	虫、粮、水	喫/吃
	粥、羹	喫/吃		
	水、酒	喫/吃、饮		
	方式	词项	方式	词项
	少吃	尝	(无)	(无)
	不咀嚼	吞		
	无节制	噎(饭、酒)		
使……吃	餵/喂			
时段	主体:人		主体:鱼、鸟	
清末至今	对象	词项	对象	词项
	饭、粥	吃	虫、粮	吃
	水、酒	喝	水	喝
	方式	词项	方式	词项
	少吃	尝	(无)	(无)
	不咀嚼	吞		
	略饮少许	抿		
	使……吃	喂		

如表3所示,汉语不同历史时期“吃喝”概念场的切分会因主体、对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先秦至隋,根据饮食对象“饭”“粥、羹”“水、酒”的不同分为三类;根据饮食主体“人”“鱼、鸟”的不同分为两类。唐至清代中叶,以上区别都消失了,无论对象和主体是什么,都合为一类。清末至今则根据对象种类的不同又分为两类。再如,任何时期都有一些专门的词语来描述吃喝的不同方式,但显然,词语的数量、意义在不同时期却会有所不同^⑧。

2.2 “吃”“喝”概念词汇化和范畴化的跨语言审视

2.2.1 “吃”“喝”概念词汇化的跨语言审视

跨语言看,“吃”“喝”概念的词汇化主要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1)有些语言把“吃”“喝”视为一个概念,用一个词来表示。一些语言中涵括了吃、喝意义的词作为上位词,仅限于在正式的书面语体中使用。如英语的 consume“消费”和 ingest“摄食”(Newman,2009:3),朝鲜语的中朝合璧词 sepchwi ha-“消费或吸收”(Song,2009:200)。在更多的语言中,包含了吃喝意义的词具有口语化的基本词地位。如孟加拉语的动词 kha (Amberber,2009:58-59),新几内亚 Manambu 语的 kə, Iatmul 语的 ki-、Ambulas 语的 ka (Aikhenvald,2009:102),尼日尔-刚果语族祖鲁语的 dla(Newman,2009:3),澳大利亚瓦尔皮里语的 ngarni,巴布亚卡拉姆语的 n̄b-(Aikhenvald,2009:104-105),等等。

^⑧ 当然,表3仅反映了汉语不同时期“吃喝”概念场的概貌,还可以做出更为详细的列表。

2)有些语言把“吃”“喝”看作两个概念,分别用不同的词表示。多数语言中“吃”“喝”是同级词关系。如英语的 eat 和 drink,非洲尼日尔—刚果语族诸语言的“吃”与“喝”(Bonvini, 2008:287)。有些语言中“喝”是“吃”的下位词。像朝鲜语中所有喝的东西都可以用“吃”来表示,如 wuyu-“牛奶”既可用 masi-“喝”,也可用 mek-“吃”。(Song, 2009:199-200)日语不同的动词“吃”(hamu, tabu, kuu 和 kurau)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都表示过“喝”的行为。(Yamaguchi, 2009:181)还有少数语言中有“喝”,但没有与“喝”概括性对应的“吃”。如古尔语支 Mooré 语“吃喝”词汇场的成员有:di“吃(不能咀嚼的东西)”、lélem“舔”、kaghlé“嘎吱嘎吱地咀嚼”、wábé“咀嚼、放牧、(让动物)吃草”、nyü“喝”、föoghé“吸收”、dumi“咬;叮”、möghé“吮吸”、vélé“吞”。(Bonvini, 2008:270)

从构词形式上看,“吃”“喝”既可能是单纯词,也可能是复合词或复合语素。如在澳大利亚的 Mayali 语中,动词 ngu“吃”是单纯词,而 bo-ngu“喝”则是双语素形式,源自 bo“液体”和 ngu“吃”。在与 Mayali 语有亲缘关系的 Gun-gurrng 语中,动词 yak-wa“吃;喝”是复合词,由 yak“没有,无”和 wa“跟随”组成,其字面意思是“没有跟随”。还有少数语言中没有专门表示“吃”“喝”意义的词语,如在北美阿萨斯卡诸语言中,“吃”“喝”的意义用并入语素 sa-“放进嘴里”与各种分类动词词根相结合来表达。(Newman, 2009:4)

2.2.2 “吃”“喝”概念范畴化的跨语言审视

人们摄取食物的过程,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可以涉及不同种类的物质。该活动如何被范畴化,在不同的语言中往往会有所不同。那么,该概念场被切分的方式是否具有系统的一致性呢?通过已调查的跨语言材料的比较可以发现,“吃喝”概念场往往根据几个不同的维度或参数进行切分,按照其常见性等级,这些参数可大致排列为:

吃的方式 > 被吃食物的种类或质地 > 吃者主体的不同、吃的时间、被吃食物的状态或数量。

亚马逊南部阿拉瓦的 Jarawara 语有多个描述“吃”方式的动词:-kaba-“涉及多次咀嚼地吃(如吃肉、鱼、甜玉米)”,jome-na-“需要很少或根本不需要咀嚼地吃(如吃橘子或香蕉,也用于吞咽药丸)”,komo-na-“吐出籽地吃”,bako-na-“用吸的方式吃(如吃西瓜、甘蔗)”。(Aikhenvald, 2009:106)英语也有多个动词表示吃的不同方式:chew“咀嚼”、chomp“大声地咀嚼;反复咀嚼”、crunch“嘎吱嘎吱地咀嚼”、gnaw“咬”、nibble“一点点地咬;咬”、pick“少量地吃,挑肥拣瘦地吃”、peck“啄”、sip“啜饮”、slurp“饮食出声”、suck“吸”、lap“舔食”、bite“咬;啃”。(Rice, 2009:121; Amberber, 2009:59)

吃者主体不同被范畴化的例子,如非洲尼日尔—刚果语族古尔语支 Fongbe 语的动词 qù 有“吃;咀嚼,啃,咬,叮,吸收”多个意义,当其表示“叮、咬”义时,施事只限于蚊子;若其他种类的昆虫为施事,则用动词 mè;当蛇为施事时,会优先选用 sá。(Bonvini, 2008:274)关注“吃”时间不同的语言,如切瓦语(班图语系)的-fisula“吃早餐”、-gwetsa ntsamilo“吃上午点心”。(Bonvini, 2008:269)

澳洲迪尔巴尔语 Girramay 方言根据被消费食物的种类,有三个特定的及物动词“吃”:rubima-“吃鱼”,burnyja-“吃肉”和 nanba-“吃蔬菜”。(Aikhenvald, 2009:106)在澳大利亚沃

尔皮里语中,除 ngarni“摄食,吃,喝”之外,还有动词 yilyi-wirrpini“喝、吸、舔舐(袋鼠的血液、脂肪等)浓的或热的液体”,kuuny-nga-rni“吃、喝蜂蜜”,kunykuny-nga-rni,“吸取、吮吸花蜜”。(Wierzbicka,2009:77-81)班图语系切瓦语的动词“吃”,根据食物质地的不同分为-monyola“吃软的或易折断的东西(如香蕉、稠粥等)”,-kukuta“吃硬的或者听起来很硬的东西(如苹果、青玉米等)”,-bubuda“啃;蚕食;吃硬的东西(如骨头、玉米、硬肉等)”。(Bonvini,2008:269)北美阿萨巴斯卡诸语言中大多数的吃喝表达式,通过结合分类动词词根和状语前缀来关注吃喝对象质地、状态、数量等的不同。如纳瓦霍语的“吃”“喝”动词有不少于15个的动词词根系统(详见 Rice,2009:120)。

现在,我们来看汉语“吃”“喝”概念的历时词汇化与范畴化方式,与以上跨语言共时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之间的关系。由表1可知,汉语“吃”“喝”概念的历时词汇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或者用一个词语来表示,或者用两个不同的词语来表示。当用一个词语来表示吃喝概念时,该词属于基本词;当用两个词语分别表示时,两词是同级词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汉语“吃喝”概念场历时范畴化的参数中,最常出现的是吃喝动作的方式,其次是动作对象的种类,动作主体的不同被范畴化的频次最低。显然,汉语“吃”“喝”概念历时词汇化和范畴化的方式与跨语言共时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高度符合,即“吃”“喝”概念历时词汇化所采用的方式是在共时词汇化中更为常见的方式;“吃喝”概念场历时范畴化所依据参数的出现频次与这些参数在共时平面表现出来的常见性等级相一致。

此外,如表2所示,汉语不同方言表达“吃”“喝”概念的词语呈现复杂、交错分布状态,该现象也具有一定的共性。跨语言看,一些在地理上、谱系上或文化上关系极为密切的语言,在“吃”“喝”词语的使用上却常会有所不同。像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诸语言也都存在此类现象。以澳大利亚诸语言为例,澳大利亚北部沙漠边界谱系群亚帕次语群的一些语言会用一个词语表示吃喝义(如瓦尔皮里语的 ngarni 和 Ngardi 语的 ngarnanta),但来自同一次语群的 Warlmanpa 语却用两个不同的词语表示。邻近的语言只有 Mudbura 语和 Walmatjarri 语用一个词语表示吃喝义(Mudbura 语用 nga-nyja、Walmatjarri 语用 nganyja),同一次语群的其他语言都采用两个词语。在马宁里达次语群的四种语言中,只有两种语言用一个词语表示吃喝义:那一卡拉语有 bara“吃,喝,咬”,还有 dja“吃,喝”;Burarra 语用 bay“吃,喝;咬,吸(烟)”。(Aikhenvald,2009:91-105)

三 “吃”“喝”类动词的语义扩展

汉语“吃”“喝”类动词在历史演变或共时分布中出现了哪些语义扩展(semantic extensions)? 我们应该如何将其分类? 它们的意义是如何改变的? 哪些语义关联模式在不同语言中反复发生? 哪些关联模式极少发生或为汉语所独有? 本节我们尝试从符意学角度考察“吃”“喝”类动词的多义衍生模式,并据此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Newman(1997,2009)根据吃喝行为的经验现实,构建了一个解释力极强的框架来阐发“吃”“喝”动词各种隐喻扩展的动因(motivation),包括三个方面:(1)基于施事的扩展;(2)基于受事的扩展;(3)基于施事和受事的扩展。下面,我们将借助 Newman 的框架来讨论以

上问题。

3.1 基于施事的语义扩展

“吃”“喝”动词的一些隐喻扩展被吃喝过程中施事的某些特性所驱动。首先,在此过程中施事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强烈“内化”的形象——把食物和饮料吸入了体内。此外,还有伴随着吃喝行为的感官体验,包括与食物接触后口腔味蕾产生的愉悦的感觉和消化后的满足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如饥荒时为了生存而吃)所产生的不愉快体验。我们可以把这些基于吃喝者角色而产生的语义扩展统一称为“内化”(internalization)。(Newman,2009:8)

3.1.1 愉快的吸入、吸烟等

“吃”“喝”动词可以扩展指摄取非食物和饮料的其他物质如空气、香烟等进入身体。古代汉语有“食气”“食风”“饮风”的说法。例如西汉《淮南子·地形》:“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吞魔食鬼,横身饮风。”其中的“食气”“饮风”都指呼吸新鲜空气^⑨。现代海口方言仍说“食风”。19世纪的文献中开始出现“吃烟”的用例,像《儿女英雄传》中有30例之多(谢晓明、左双菊,2007),可见此说法在当时极为常见。但到普通话中,“烟”只能与“抽;吸”组合。42个方言点中,厦门、梅县、福州、东莞等7个方言点用“食烟”;建瓯方言用“馐^⑩烟”;其它方言都说“吃/喫烟”。(陈瑶,2013:20)历史文献中没有发现“喝烟”的用法,在湖南常德、湖北恩施、天门方言中这样的说法很常见。(徐宜良,2014)

跨语言看,一些语言用“吃”表示“吸(烟)”义,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语的 nengé“吃”。(Lang,1975:178,转引自 Newman,2009:9-10)也有一些语言“吃”“喝”用一个词语表示,该词语同时也表示“吸(烟)”义,如新几内亚 Manambu 语的 ki-、Ambulas 语的 ka、Burarra 语的 bay 及 Djapu 语的 luka。(Aikhenvald,2009:105)但更多的语言是用“喝”来表示“吸(烟)”义,如豪萨语的 shaa(Newman,2009:10)、阿姆哈拉语的 t'ot't'(Newman & Abera,2009)、普卢瓦特语的 wún(Elbert,1972:210)、日语的 nomu(Yamaguchi,2009:179)、朝鲜语的 masi-(Song,2009:203)、法语的 boire,以及非洲卡塞姆语的 n̄a、proto-Gbaya 语的 'no、恩巴恩迪语的 nyō(Boyeldieu,2008:308),等等。还有少数语言“吃”“喝”都可以表示“吸(烟)”义,但语义有所不同。如非洲 Beja 语的 g'ʔa“喝、吸(烟)”和 g'iham“小口吃,吞下,吸(烟)但没有吸入”。(Boyeldieu,2008:308)

3.1.2 情感或思想上的满足、享受

汉语的“食”“饮”“吃”都可用于表达情感或思想上的满足、享受。如古代“食”常与“禄”“俸”“国”“采”“税”“征”等搭配,指享用俸禄、封邑的租赋或税收;“饮”可与“泽”“惠”“德”“恩德”等组合,谓享受恩泽、恩惠。现代还有“饮誉”一词,指享有盛名。“吃”的该用法在普通话

^⑨ 有意思的是,“吃”“喝”与“风”搭配时意义却发生了改变。如“吃东西风”(《祖堂集》)、“喝风”(《原本老乞大》)、“喝西北风”(普通话)都喻指没有东西吃、挨饿。

^⑩ “馐”本义指给在田间耕作的人送饭。《说文·食部》:“馐,饷田也。”《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馐彼南亩。”在闽北的建瓯方言中“馐”表进食义。

及方言中很常见。如普通话说“吃甜头”“吃回扣”“吃空额”等。方言中万荣说“吃贿”、忻州与太原说“吃贿赂”、武汉说“吃钱”、牟平说“吃小篓儿”、建瓯说“馊冤枉”都指受贿。普通话中的“吃香;吃得开”、南京的“吃得干”、黎川的“吃得过”都表示受欢迎。普通话说“吃马屁”、福州说“食褒”指喜欢听好话。(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

在很多语言中“吃”都可以表达享受和满足的意义。如阿姆哈拉语的 *bell*“吃”可用于“吃赌博”(赢得打赌)、“吃工资”(接受工资)、“吃赔偿”(接受赔偿)、“吃贿赂”(接受贿赂)、“吃奖杯”(赢得奖杯)等。(Newman & Abera,2009:262-263)豪萨语的 *ci*“吃”可组成“吃考试”(通过考试)、“吃王权”(获得王权)、“吃益处”(获益)、“吃奖杯”(赢得奖杯)、“吃成功”(获得成功)、“吃钱”(贪污钱财)、“吃野心”(实现野心)等。(Jaggar & Buba,2009:235-237)据 Gouffé(1966)、Bonvini(2008)和 Pardeshi et al.(2006)，“吃”与“享受”之间的一词多义在非洲和亚洲语言中很常见，如 Fongbe 语、祖鲁语、中非萨拉一邦戈一巴吉尔米语的“吃”都有快乐、享受的意义；Fongbe 语和杜阿拉语的“吃”都有获利义。也有一些语言用“喝”表达情感上的满足。如法语的 *boire*“喝”扩展表示“享受；细细品味；心醉；着迷”义。(Boyeldieu,2008:312)豪萨语的 *shaa*“喝”引申出“欣赏；享受”义，如“喝幸福”指玩得很开心。(Jaggar & Buba,2009:242)阿姆哈拉语的 *t'ət'*“喝”也有“享受、接受”义，如“喝太阳”指享受阳光；“喝奶油”指非常满足。(Newman & Abera,2009:268)

在以上情况下，食物、饮料进入体内的源域映射到实体进入一个人的财产范围或情感领域的目标域，主语由于接收了另一实体而有所获益。同时，与吃喝有关的积极的感官体验也与全面理解该隐喻用法密切相关，即伴随着吃而产生的令人愉快的味觉映射到伴随着由于拥有新财产(俸禄、赋税、贿赂等)、新情感(恩德、称赞、声誉等)而产生的愉悦的体验。

3.1.3 经历不愉快

汉语的“食”“饮”“吃”也有表示不愉快体验的用法。例如：

- (1)自我祖尔，三岁食贫。(《诗经·卫风·氓》)
- (2)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南朝梁江淹《恨赋》)
- (3)却笑喫亏隋炀帝，破家亡国为谁人？(唐杜牧《隋苑》诗)

例(1)“食贫”谓过贫苦的生活。但“食”表示不愉快体验的用例较少，“饮”此种用法的例子要多一些。除了例(2)的“饮恨”，还有“饮贫”“饮气”“饮冤”等说法。“吃”在晚唐五代派生出“遭受、挨”义，此义位在近代汉语中很常用，如“喫亏”(例(3))、“喫杖”(敦煌变文)、“喫辛苦”(《朱子语录》)、“吃官司”(元曲)、“吃冷”(《西游记》)、“吃苦头”(《何典》)等。“吃”的该用法在普通话和大部分方言中都有保存，如普通话说“吃惊”“吃苦”“吃批评”“吃罚单”等；方言中如苏州“吃搁头”指吃批评、受处分，哈尔滨“吃挂落儿”指受连累，武汉“吃拼”指受欺负，上海、苏州“吃夹当”指夹在中间受冤枉气。(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

跨语言看，“吃”与“不愉快体验”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语义关联。如“吃”在 *koyukon* 语、阿萨巴斯卡语中有“生气”义；在法语、俄语、Kirundi 语中有“痒；使发炎”义；在卡塞姆语、朝鲜语中有“被羞辱”义；在法语、拉丁语、Mwotlap 语中有“被打；挨打”义；在卡塞姆语、Fongbe 语中有“羞愧”义；等等。此外，像汉语一样，卡塞姆语、Mooré 语、Fongbe 语、阿干

语、富拉尼语、杜阿拉语、基隆迪语、刚果语、萨拉一邦戈一巴吉尔米语、巴西葡萄牙语、豪萨语及朝鲜语的“吃”都扩展表遭受义。如朝鲜语的 mek-“吃”可用于“吃批评”“吃罚球”“吃高温(指中暑)”等(Song, 2009: 211); 在豪萨语中,“吃某人的荣誉”指侮辱某人,“吃某人的信任”指背叛某人,“吃某人的脸”指羞辱某人,“吃某人的尊严”指冒犯某人。(Jaggar & Buba, 2009: 238-239)也有一些语言用“喝”表达不愉快的体验。如法语的 boire“喝”有“接受、遭受;忍受、受苦”义,可以构成固定搭配如“遭受打击;蒙受奇耻大辱;被雨淋湿;感冒;落满灰尘;上年纪”等;(Boyeldieu, 2008: 312)豪萨语的 shaa“喝”引申出“经受、遭受、忍受”义,可与“麻烦”“倒霉”“严重的损失”“训斥”“重负”等搭配。(Jaggar & Buba, 2009: 241-242)

“吃”“喝”之所以可以表示不愉快的体验,是因为摄食不健康、不卫生的东西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因而对这些“坏”食物进行内化的结果通常是不愉快的。

3.1.4 吸收

普通话中“吃”有吸收(液体)义。例如:宣纸很吃墨/这块布不吃染料。在此种用法中,“吃”的主语要求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如纸、布、地),宾语要求是某种液体(如墨、染料、水)。方言中西安、上海、武汉、扬州、崇明、萍乡、金华等的“吃”,厦门、海口的“食”均有此种用法。(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豪萨语和朝鲜语的“吃”也用于(织物)吸收(染料)。另有一些语言用“喝”表示吸收义。如豪萨语表示吸收义时,shaa“喝”比 ci“吃”更常用。shaa“喝”的该用法要求主语是汽车、裤子、长袍、衣服等无生命的物体,该物体的状态由于吸收的行为而发生了某种变化;宾语是某项活动或某种物质实体(多为液体),它们是导致主语发生变化的源头或原因。例如 mootaa taa shaa guugaa“汽车喝擦亮”,义为汽车是闪亮而有光泽的。(Jaggar & Buba, 2009: 243, 249)阿姆哈拉语的 t'ot't“喝”表吸收义时,主语是兽皮、发动机、衣物、门、植物等无生物,宾语是油、水、油漆、奶油等液体。(Newman & Aberra, 2009: 262-263)法语的 boire“喝”也有该种用法。从扩展动因看,吸收义显然是由人从身体外部摄取食物或饮料到嘴巴中的源域投射到纸、布等物体吸收液体的目标域而产生的。

3.1.5 理解、体会

普通话中“吃(不/得)透”“吃(不/得)准”中的“吃”表示“理解、体会”义。“吃”是身体对食物所提供营养的吸收过程,而“理解、体会”则是思想上对事物本质了解、掌握的过程,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阿拉伯语和法语的 boire“喝”都有“理解”义,Boyeldieu (2008: 311-312)认为,该意义的扩展源自于“思想上吸收”的结果。

3.2 基于受事的语义扩展

基于受事的语义扩展关注吃喝过程中受事(即被消费的食物、饮料)发生了什么。食物和饮料最显著的变化是,它们从视线中消失了,变成了难以见到的身体的一部分。对食物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们经过相当粗暴的处理(被嚼碎)后转变为可消化的颗粒,“吃”因此尤其适合作为破坏意象的来源。(Newman, 2009: 15-16)

3.2.1 进入

(4)又有铁甲小船,所以缠护炮台,四面伏击,最为灵活坚利。惟食水过深,不能远越重洋。(清薛福成《应诏陈言疏》)

(5) 铣刨时吃刀不可过浅。(普通话)

进食即食物进入体内,汉语的“食”“吃”由此派生出某物体进入另一物体的意义。例(4)“食水”指船身入水的深度,借指船的载重量,该意义普通话说成“吃水”。例(5)“吃刀”指切削金属时刀具切入工件,方言中扬州、上海、杭州、宁波、萍乡的“吃”,厦门、广州的“食”都有此义。上海还说“吃肉”,指削水果皮时,皮去得太多,刀切入果肉。(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

3.2.2 侵吞、吞没

(6) 谢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饮矢之半。(《金史·太祖纪》)

(7) 他们一年之中,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

例(6)的“饮”表示吞没、隐没义,类似的用法还有“饮羽”“饮刃”等。近代汉语晚期“吃”扩展表示侵吞、吞没义,如例(7)。“吃”的该意义在一些方言中仍有保留,如崇明说“吃黑”、宁波说“吃没”、上海说“黑喫黑”“吃没”。(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非洲卡塞姆语、Fongbe语、班巴拉语的“吃”也有吞没、吞噬义,都多用于比喻义中。(Bonvini,2008:276—287)“饮”“吃”吞没义的产生,显然是基于食物、饮料从视线中消失了,变成难以见到的身体的一部分这样的事实。

3.2.3 耗费、消耗

如果受事是力量、精力等,则“吃”表耗费、消耗义。如普通话及上海、杭州、西安、黎川等方言中说“吃力”^①,海口、福州、厦门说“食力”,建瓯说“馐力”,都表示费力义;普通话及上海、忻州等的“吃劲”指很费劲。方言中,“吃”的这一意义还可以与燃料、能源搭配,如苏州、扬州、上海的“吃料”,海口、厦门的“食料”都指费材料;扬州“吃油”指做菜时耗油多;厦门“食油”指(汽车等)耗油量大。(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在日语中,“吃”表耗费、消耗义时,其受事仅限于特定的物质,如燃料、能源、金钱或时间。在此情况下,这些物质不仅仅是被消耗了,还包含有它们的供给是“浪费”的意思,因为它们或是使用过度了,或是超过了一个人能负担得起或者预期的范围。(Yamaguchi,2009:184)非洲卡塞姆语、Fongbe语、Mooré语、萨拉一邦戈一巴吉尔米语、豪萨语的“吃”都有“耗费、消耗;浪费、花费”义,多与时间、金钱、财产等搭配。朝鲜语、阿姆哈拉语的“吃”指(汽车等)消耗燃料。

3.2.4 除去、消灭

普通话“吃”表示除去对方的棋子、消灭对方的意义多用于弈棋和军事用语中。例如:拿车(jū)吃他的炮。萍乡、柳州、牟平、西宁、贵阳等方言中的“吃”,福州、雷州、梅州的“食”都有该用法。卡塞姆语、Fongbe语、富拉尼语、萨拉语、萨拉一邦戈一巴吉尔米语、巴吉尔米语、巴西葡萄牙语、豪萨语、阿姆哈拉语和日语中的“吃”都有打败、战胜的意义。像中非萨拉一邦戈一巴吉尔米语的“吃”也多用于比赛中击败对手,巴西葡萄牙语的“吃”用于在象棋或跳棋中打败对方。(Bonvini,2008:282—284)

以上“耗费、消耗”“除去、消灭”都含有破坏义。跨语言看,很多语言中“吃”的语义扩展

^① 按:扬州、杭州、上海、金华说“吃力”还指累,疲劳。(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

都与破坏义有关。如英语的 eat into“腐蚀;侵蚀”;祖鲁语的 dla“吃”扩展出“侵蚀;生锈;腐蚀;磨损”义。(Newman,2009:16)Manambu 语的 kə-“吃;喝”表示“淹死;烧毁;摧毁;消灭”义。(Aikhenvald,2009:93-97)Fongbe 语、Mooré 语、富拉尼语、基隆迪语、萨拉-邦戈-巴吉尔米语、豪萨语、阿姆哈拉语、纳瓦特尔语、日语、朝鲜语和 Manambu 语的“吃”都有折磨、伤害、破坏义;豪萨语、阿姆哈拉语、Mwotlap 语、Manambu 语的“吃”都有烧毁义。该类隐喻扩展涉及从食物被嚼碎的源域投射到其他域,在这些域中,一些实体(对应于源域中的吃者)对其他实体(对应于被吃的东西)施加了破坏性的影响。

3.3 基于施事和受事的扩展

动词“吃”“喝”的有些语义扩展同时建立在基于施事和受事两个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如“食言”和性交义。汉语早在《尚书》中就有“食言”的说法,并一直沿用至今^②。

“吃”可以作为性交概念的一个来源。如汉语建瓯方言“馐”有交合的意义,当地骂人时常说“馐戾”(交媾)。(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Rumu 语的 nana“消费、吃、喝”与 tu“肠子”连用表示性交。(Newman,2009:19)在因纽特语中,动词化词缀-tuq 根据其前面出现名词的不同,可以分别表示“吃、喝;反复做某事;性交”等意义。(Hénault,2008:297)在澳大利亚的 Yir-Yoront 语、美洲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非洲的豪萨语、祖鲁语及几种土著语中,“吃”都可以表示做爱、性交。(Gouffé,1966;Bonvini,2008;Newman,2009)性交既包括内化的意义(即性交作为一种生理上愉悦的感觉可以被内化),又包括破坏的意义(即施事在性征服过程中对受事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此该隐喻扩展同时基于施事和受事两个方面。当然,正如是 Song(2009:207)所说,是基于施事的内化还是基于受事的破坏,两个方面是相伴而生的,注意力的焦点决定了更凸显哪个方面,或者是两个方面都关注。

3.4 “吃”“喝”类动词的语法化

汉语的“吃”“喝”类动词中,只有“吃”发生过语法化。据江蓝生(1989),“吃”表被动的用例最早出现在唐五代,在宋元话本、元明白话小说以及明代拟话本中使用十分频繁。“吃”被动标记的用法是由蒙受、遭受义发展而来的,其句法演变过程为:“吃+名”(如“吃杖”)→“吃+动”(如“吃捆”)→“吃+名+动”(如“吃箭穿”)。近代汉语中“吃”由蒙受、遭受义还进一步演化出表致使义和表原因的用法。(蒋绍愚、曹广顺主编,2005:395)“吃”的以上语法化用法在普通话和方言中没有传承下来。

跨语言看,与动词“做”“要”“去”“来”等不同,“吃”“喝”类动词很少发生语法化。(Hook & Pardeshi,2009:153)目前见到较多报道的就是“吃”作为被动标记的用法。在僧伽罗语、朝鲜语、现代希腊语、卡利亚语、朱昂语等语言中,动词“吃”与从动词派生出来的(deverbal)或像动词(verb-like)的宾语结合使用,可翻译为被动句。例如:

(8) Kikili lamajagan maerun kae:va. (印欧语系的僧伽罗语)

小鸡 孩子.工具 死亡 吃

小鸡被孩子杀死了。

^② 《尚书·汤誓》:“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对“食言”理据的分析参 Newman(2009:18)。

Haspelmath(1990:41)认为以上语言中的“吃”都已用作被动标记,Næss(2009:34)则认为此种用法的“吃”都已语法化为表示施事受到影响或遭遇不幸的标志。豪萨语的动词 ci“吃”和 shaa“喝”都可以用于该结构。例如:

(9) yaa ci/shaa duukaa. (乍得语系的豪萨语)

他.被动态 吃/喝 打.动名词

他被毒打。

例(9)中“吃”“喝”的区别在于,用 shaa 表示“一般的遭受”,用 ci 表示“严重的遭受”。“吃”“喝”此种用法的典型特征是要选择动名词作为宾语,如该例中的动名词 duukaa 基于动词 dookaa“殴打;鞭打;击打”。Newman(2009:13-14)指出,尽管以上例子可以分析为(无施事)的不幸被动式(adversative passive construction),但“吃”“喝”的此种用法与它们带名词表示“遭受”义的用法并没有太大不同。我们赞同 Newman 的分析,因为以汉语被动标记“吃”的语法化过程为参照,朝鲜语、僧伽罗语等语言中“吃”表示“遭受”的实词义还很明显,其语法化程度显然很低。

除了用作被动标记,还看到“吃”语法化为动词后缀的报道。如 Chepang 语(藏缅语族、尼泊尔)的动词后缀-je?,既表示完成或终结的意义,又具有“对整体情境满意和高兴”的意义。Caughley(1982:97)将该词缀称为“情境情感”(situational emotive)后缀,并认为它是由动词-je?“吃”扩展而来的。与“吃”相比,“喝”的语法化更为少见。据 Jaggar & Buba(2009:243-245),豪萨语的 shaa“喝”可语法化为程度动词(a degree verb),表示“有规律地、频繁地、许多地”等量的意义,其后可出现动词、动名词和表示活动的名词,如“喝笑、喝哭、喝来、喝观看、喝战争、喝冲突”。

四 “吃”“喝”类动词的形态句法特征

本节尝试从词汇与语法互动的角度考察“吃”“喝”类动词所具有的形态句法特征,主要关注致使结构、及物和不及物交替、宾语的语义类型等问题。

4.1 “吃”“喝”类动词的致使结构

跨语言的事实表明,“吃”“喝”类动词表达致使结构(causativisation)^⑬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词汇型、形态型和分析型。(Amberber,2009:53)此处我们仅讨论形态型致使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古今致使化策略的转变两个问题。

4.1.1 “吃”“喝”类动词形态型致使结构的特殊性

已有的研究表明,早期汉语中曾经存在过形态型致使结构,该结构主要通过附加词缀、辅音屈折、声调变化等形态手段来表达致使范畴。如关于“吃”“喝”类动词的形态型致使方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⑭:(i)加*s-前缀。如梅祖麟(1989)将“食”构拟为*djək > dzjək、

⑬ 国内对致使结构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致使句、使役句、使动用法、使动范畴等。

⑭ 也有学者持其他看法,参冯英和曾晓渝(2004)、金理新(2005)、洪波(2009)等。

“飮”构拟为*s_dɣəks>zi^⑮。(ii)加*-s后缀。雅洪托夫(1969)指出,“饮”“食”二词均赖是否有-s尾区别自动与使动^⑯。(iii)用去声破读表示。周法高(1962)、王力(1965)、潘悟云(1991)等都认为“饮”“啖”有自动和使动之分,去声破读表示使动。此前已有多位学者注意到,上古汉语的形态型致使式多用于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很少用于及物动词。在可以构成形态型致使的及物动词中,“吃”“喝”类动词最为常见,如据方文一(2004)考察,出现使动用法的词语《左传》共154个、《诗经》共86个,其中及物动词用作使动的《左传》仅19个、《诗经》10个。在《左传》有使动用法的及物动词中,“食”“饮”的出现频次最高,都在20例以上^⑰。(姚庆保,2002)

跨语言看,许多有形态型致使范畴的语言限制该结构仅可用于不及物动词。但也有些语言可放宽这一限制,会允许少量及物动词用于形态型致使结构中,这些及物动词通常包括“吃”“喝”类动词。如在阿姆哈拉语、帕劳语(南岛语族)、德拉威语、僧伽罗语和马里科帕语中,“吃”“喝”动词和其他一些动词(包括smoke“吸烟”、lick“舔”、know“知道”等和感知动词)是一组特别需要采用形态致使形式的及物动词。(Dixon,2000:56;Næss,2007:63-64)据Guerssel(1986),亚非语系柏柏尔语有一个能产的形态致使模式,即通过致使前缀ss-由不及物动词派生致使形式。但有一些被称作“吃类”的动词(包括ttc“吃”、sw“喝”,jjawn“饱食”和tted“吸”等)则很例外,它们是及物动词却可以被致使化,有违柏柏尔语的致使模式。(转引自Amberber,2009:50-51)亚非语系阿姆哈拉语中有两个多产的形态致使前缀:a-和as-,前缀a-仅能用于不及物动词,前缀as-既可用于及物动词也可用于不及物动词。但例外的是,该语言中有十个左右的及物动词,包括bälla“吃”、t'ət't'a“喝”、lasə“舔”、t'əbba“吸”、k'əmməsə“品尝”、wat'ə“吞咽”等,它们除了可以用前缀as-构成致使,也可以像不及物动词一样用致使前缀a-,Demoz(1964)把这些词语统称为“摄食”类词语。(转引自Amberber,2009:47-48)更多的例子可参阅(Amberber,2009;Næss,2007,2009)。显然,上古汉语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中,“食”“饮”的出现频次最高,该现象具有一定的跨语言共性。

4.1.2 汉语“吃”“喝”类动词致使化策略的转变

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我们发现汉语“吃”“喝”类动词的致使化方式古今发生了较大转变。先秦西汉时期,“吃”“喝”类动词最常见的致使形式是用祥吏切的“食(sì)”和於禁切的“饮(yìn)”表达的形态型(如例(10)(11))^⑱;分析型仅见到由表示使令义的“使”作致使词构成的使令式致使句,且用例很少(如例(12))。

(10)秋九月,晋侯饮(yìn)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左传·宣公二年》

(11)更持去,以恶食食(sì)项王使者。《史记·项羽本纪》

^⑮ 梅祖麟(2008)又将“食”的构拟改为*N-ljək>*djək>dejək,“飮”的改为*s-ljəks>*ljəks>zi。

^⑯ 早期的使动词就是形态型致使的隐性表现形式,后来随着汉语形态手段的消失,使动用法成为句法手段。

^⑰ 《左传》中使动用例数在5至10例之间的及物动词有“衣、朝、服、属”四个,其他用例更少。参姚庆保(2002)。

^⑱ 例(10)(11)中的“饮(yìn)”“食(sì)”通过语音变化的形态手段来表示“给/让……喝/吃”的使动义。

(12) 观从使子干食(shí), 坎用牲, 加书, 而速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食”“饮”的形态型致使式东汉以后逐渐减少, 最晚到隋朝时已趋于消亡了; 分析型致使式则随着致使词的增加逐渐多样化。例如:

(13) 逼我使食, 我甚愁恼。(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三)

(14) 自今已后随意所欲, 亦不饮酒, 亦不教人使饮酒。(刘宋沮渠京声译《佛说八关斋经》)

(15) 酒肉独自抽^⑩, 糟糠遣他喫。(王梵志《思量小家妇》诗)

(16) 招庆拈问保福: “将饭与人喫, 感恩则有分, 为什摩却成不具眼去?”(《祖堂集·丹霞和尚》)

例(13)在使令动词“逼”之后、表示结果的谓语“食”之前又附加了一个致使词“使”。例(14)中有两个致使标记“教”和“使”, 与一般的致动式相比, 多了一个致使词“使”。以上两种特殊的致使式都是在中古佛经文献中新兴的复合分析型致使结构^⑪。例(15)(16)的致使词分别由“遣”和“与”充当。到普通话中, “使”“令”“让”“叫”“要”“给”等都可以充当致使词(牛顺心, 2007), “吃”“喝”类动词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形式更加多样。而且在普通话及各方言中, “吃”“喝”类动词的致使形式都以分析型为主, 区别仅在于致使词的不同。

据已有研究, 藏缅语的“吃”“喝”类动词主要采用附加词缀和辅音屈折的方式来构成形态型致使式。附加致使词缀多采用附加*s-前缀。如北部羌语荣红话: t^hə“吃、喝”; ɛtɕi“喂”(前缀受词首辅音的影响变为舌面音 ɛ-); 曲谷羌语中 t^hə“喝”; stə“喂”。(黄成龙, 2014)也有附加其他粘着成分的, 如怒语(阿依)an⁵⁵“喝”; sɿ³¹an⁵⁵“使喝”。(杜若明, 1990)采用辅音屈折形式的如傣语, 其浊音声母是自动, 清音声母是使动, 如: dɔ³³“喝”; tɔ³³“使喝”; dza“吃”; tɕua⁵⁵“使吃”。(戴庆厦, 1981)还有语言采用松紧元音或声调变化的方式。前者如载瓦语的 tso³¹“吃”; tso³¹“使吃”, 后者如拉祜语的 tsa⁵³“吃”; tsa³¹“使吃”。(戴庆厦, 1981)但现代藏缅语动词的形态型致使只是一种残存现象, 自动和使动的对应只出现在少数词中, 已不具备普遍意义。绝大多数动词通过分析形式来表示以前由形态手段表示的意义。部分语言如哈尼语、白语、纳西语等, 其动词致使范畴的形态特征已完全消失, 只用分析形式。目前, 保存自动词、使动词对立的藏缅语族语言除嘉绒语外, 都是形态形式与分析形式并存, 而且分析形式的使用更加广泛。(杜若明, 1990)以上藏缅语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 汉语“吃”“喝”类动词的致使表达策略由上古以形态手段为主到近现代以分析方式为主的转变, 在汉藏语系诸语言中具有显著的共性。

4.2 及物和不及物交替(alternants)

从语义构成看, 上古汉语的“食”和“饮”均可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个变体: 不及物的“食_{intr.}”“饮_{intr.}”既表示动作, 也隐含了对象“饭”“水/酒”, 是上古汉语表达“吃饭”“喝水/酒”

^⑩ 项楚(2010:298)指出:“抽, 疑当作‘袖’, 藏也。”

^⑪ 例(13)(14)转引自牛顺心(2007), 牛文分别把它们称之为强化使令式和强化致动式。

事件的基本形式^①；及物的“食_{tr.}”“饮_{tr.}”只表示动作，不隐含对象^②。“食_{intr.}”“饮_{intr.}”最常见的形式就是V。例如《国语·晋语九》：“襄子将食_{intr.}。”《诗经·小雅·湛露》：“厌厌夜饮_{intr.}，不醉无归。”“食_{intr.}”“饮_{intr.}”由于表达的是一个事件，所以可以居于句首，表示话题或时间。表示话题的用例，如《吕氏春秋·季春纪》：“饮_{intr.}必小咽，端直无戾。”表示时间的用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唯食_{intr.}忘忧。”“食_{tr.}”“饮_{tr.}”最常见的组合是出现在“V+N_{受事}”中。“食_{tr.}”的受事是“饭”以外的其他固体或半流体食物，“饮_{tr.}”的受事是“水、酒、汤、药”等可以喝的液体。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臣闻齐人将食_{tr.}鲁之麦。”《孟子·滕文公下》：“夫蚓，上食槁壤，下饮_{tr.}黄泉。”在先秦西汉文献中，“食_{intr.}”的例句较多，“食_{tr.}”例句不多；“饮”的情况则相反，“饮_{tr.}”的用例远多于“饮_{intr.}”。

类似现象也见于其他语言，这些语言有两个不同的动词表示吃喝意义，一个是及物动词，另一个是不及物动词。例如：Kiribatese语的kana“吃_{tr.}”与am'arake“吃_{intr.}”、nima“喝_{tr.}”与mooi“喝_{intr.}”；兰戈语的cammò“吃_{tr.}”与cèm“吃_{intr.}”、màttò“喝_{tr.}”与mító“喝_{intr.}”。(Newman, 2009: 4-5)但在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都是“吃”“喝”的同一个词位(lexeme)既可用于及物结构，也可用于不及物结构。在这些语言中该模式只能适用于包括“吃”“喝”在内的一小部分动词，此类动词因此被称为“伪不及物”(pseudo-intransitive)、“不稳定”或“复合及物”(ambitransitive)动词^③。这是一个在普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的模式：如果带两个参与者的动词只有一个子集可以发生及物或不及物交替，“吃”和“喝”通常是其中之一。(Næss, 2009: 28-29)

4.3 汉语“吃”“喝”宾语的语义类型

唐宋元时期，动词“吃”的宾语在语义上都是受事。明清时期，“吃”所带宾语的语义范围开始扩大，新出现了工具宾语如“吃癫碗”(《水浒传》)、处所宾语如“吃过十来处好酒肆”(《水浒传》)、来源宾语如“管山吃山，管水吃水”(《朴通事》)(谢晓明、左双菊, 2007)、方式宾语如“吃独食”(《醒世姻缘传》)，但是这些类型的宾语都不常见。普通话及各地方言中，“吃”带处所、工具、方式等非典型宾语^④的数量有所增多。“吃+N_{处所}”结构如普通话中说“吃馆子”“吃食堂”“吃大排挡”等，方言中如万荣说“吃摊子”、梅州说“食食堂”、厦门说“食菜馆”、福州说“食馆店”、建瓯说“镡炒馆店”“镡食堂”。(李荣主编, 1999; 解海江, 2006)“吃+N_{工具}”结构中的N可以是做饭的用具、吃饭的餐具、盛食物的容器等，如“吃大碗”“吃火锅”“吃罐头”“吃筷子”。“吃+N_{方式}”结构如“吃派饭”“吃西餐”“吃小灶”“吃零嘴”。在这些表方式的N

① 在一些语言中，“吃”“喝”类动词即使带有不及物的形态标记，在语义上仍是及物的。所以“吃”“喝”类动词在不及物使用时也会被解读为带了一个隐含的宾语。不及物动词“吃”最典型的解读是“吃饭”，而无宾语的“喝”更多情况下是指“喝酒”，也可指“喝水”。(Amberber, 2009: 54; Næss, 2009: 35-36)

② 此段对“食”的分析及举例都引自蒋绍恩(2011)。

③ 一些语言中及物动词也可以不带宾语，这些语言中的“吃”“喝”动词普通具有在及物和不及物句法框架之间交替的能力。

④ 以动词的必选论元受事作为宾语的是典型宾语；以工具、方式、处所、来源等可选论元作为宾语的统称为非典型宾语。

中,有些是指烹饪的方式,如小灶、西餐;有些则是“吃”这一行为的方式,如派饭、零嘴。方言中如济南、牟平说“吃小灶”,南京说“吃小锅”指享受特殊优惠待遇。“吃+N_{来源}”结构如“吃老本”“吃父母”“吃救济”“吃劳保”等。方言中长沙“吃轮供”指父母丧失劳动力后,由已分家的子女轮流供养;厦门“食厝骹、食厝税”指依靠出租房子生活;萍乡“吃息钱”指靠利息生活;雷州“食租”指依靠地租过活,“食祖公骨”指败家子依靠祖辈的遗产过活。(李荣主编,1999;解海江,2006)总的来看,“吃”带受事宾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其他非典型宾语的数量都极为有限,且具有不同程度的熟语性质。如在“中文十亿词语料库”中,“吃”所带非典型宾语的数量仅占带宾语数量的2.8%(1140次/40340次)。(陈蓓,2014:31-32)元明以来,动词“喝”一直以带受事宾语为主,普通话中“喝”后仅出现了少量的非典型宾语,如“喝大杯”。

普通话中能带非典型宾语的动词数量很少,如据陈蓓(2014:32)考察,《动词用法词典》(1999)的1223个动词中,仅74个动词能带非典型宾语,占动词总数的5.53%。已有的跨语言调查发现,非典型宾语在汉藏语系的载瓦语、越南语、苗语、壮语、泰语等分析型语言中也有出现,但在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等屈折型语言中暂未发现。如藏缅语族载瓦语的 *khoi³¹ tshan⁵⁵ tso³¹*“吃快餐”,越南语的 *an bat to*“吃大碗”、*ăn hoa hông*“吃红”(吃回扣)、*ăn lãi*“吃利息”;苗瑶语族苗语的 *nongx milzhet*“吃大碗”。(孙天琦,2010;陈蓓,2014:104-110)由此可见,“吃”带非典型宾语的现象应该与汉语作为孤立—分析型语言的类型特征密切相关。

五 结语

本文借鉴词汇类型学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成果,从人类语言词汇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角度来讨论汉语的“吃”“喝”类动词。主要结论是:

(i)汉语“吃”“喝”概念历时词汇化和范畴化的方式与跨语言共时研究所揭示的共性倾向高度符合,即“吃”“喝”概念历时词汇化所采用的方式是在共时词汇化中更为常见的方式;“吃喝”概念场历时范畴化所依据参数的出现频次与这些参数在共时平面表现出来的常见性等级相一致。汉语不同方言表达“吃”“喝”概念的词语呈现出复杂、交错的分佈状态,该现象在其他一些地理上、谱系上或文化上关系极为密切的语言中也常出现。

(ii)汉语“吃”“喝”类动词丰富的语义扩展可以分为基于施事、基于受事、同时基于施事和受事三类。跨语言看,“吃”“喝”类动词表示“愉快的吸入、吸烟”“情感或思想上的满足、享受”“经历不愉快”等语义衍生模式在多种语言中反复出现;而“吃”“喝”类动词表示“侵吞、吞没”“吸收”“理解、体会”的演变模式在汉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中较少出现;许多语言中“吃”的语义扩展都与破坏义有关。“吃”“喝”类动词语义扩展的动因来自于“吃”“喝”行为的经验现实和认知加工。“吃”“喝”类动词很少发生语法化,但近代汉语“吃”的语法化程度很高。

(iii)汉语致使表达策略由上古以形态型手段为主到隋唐以来以分析型手段为主的转变,在汉藏语系诸语言中具有显著的共性。上古汉语及物动词的形态型致使结构中,“食”“饮”的出现频次最高,以及动词“食”和“饮”同时具有及物和不及物两种用法,这些现象也具有一定的跨语言共性。而动词“吃”不仅能带典型的受事宾语,还能带处所、工具、方式、来源等非典型宾语,该现象在形态发达的综合型语言中暂未发现,可看作是汉语作为孤立—分析

型语言的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蓓 (2014)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非典型宾语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陈瑶 (2013) 汉语“吃”“喝”类词语的发展演变,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池昌海 (1992) “吃”语言与“吃”文化, 《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
- 崔宰荣 (2001) 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戴庆厦 (1981) 载瓦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 《民族语文》第4期。
- 董为光 (1995) 汉语“吃~”类说法文化探源, 《语言研究》第2期。
- 杜若明 (1990) 藏缅语动词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 《语言研究》第1期。
- 杜翔 (2002) 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方文一 (2004) 《左传》与《诗经》使动用法之比较,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冯英、曾晓渝 (2004) 汉语藏缅语“致使”义表达方式的历史层次及类型学意义,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洪波 (2009) 上古汉语*-s 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 《民族语文》第4期。
- 黄成龙 (2014) 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 《民族语文》第5期。
- 贾燕子 (2013) 也论“吃”对“食”、“饮”历时替换的不平衡性, 《汉语史学报》第十三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江蓝生 (1989) 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 《中国语文》第5期。
- 蒋绍愚 (2011) 词汇、语法和认知的表达,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蒋绍愚 (2015)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2005)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金理新 (2005) 受格动词后缀*[-s],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李荣主编 (1999)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云彤 (2013)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汉语多义词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梁冬青 (2007) “喝”表示“饮用”义的始见年代及其书证,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梁冬青 (2009) “喝”表饮用来源于元代蒙古语, 《民族语文》第5期。
- 刘半农 (1935) 《半农杂文二集》, 上海: 良友图书公司。
- 刘光坤 (1998) 《麻窝羌语研究》,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刘君敬 (2011) 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罗竹风主编 (1986) 《汉语大词典》,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吕传峰 (2005) 现代方言“喝类词”的演变层次, 《语言科学》第6期。
- 吕传峰 (2006) 近代汉语“喝类语义场”主导词的更替及相关问题, 《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梅祖麟 (1989) 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 《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与文字组》, 台北: “中央研究院”。
- 梅祖麟 (2008) 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 《民族语文》第3期。
- 聂亚宁 (2008) 从体验论看汉语“吃”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模式及其特点,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

期。

- 牛顺心 (2007) 动词上致使标记的产生及其对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影响,《语言科学》第 3 期。
- 潘悟云 (1991) 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
- 平山久雄 (2004) 试论“吃(喫)”的来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孙天琦 (2010) 现代汉语非核心论元允准模式及机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陶红印 (2000) 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语言研究》第 3 期。
- 王力 (1965) 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中华文史论丛》第 6 期。
- 王占华 (2000) “吃食堂”的认知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项楚 (2010) 《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解海江 (2006) 汉语义位“吃”词义扩展的认知研究,《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解海江、李如龙 (2004) 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语言科学》第 3 期。
- 谢晓明、左双菊 (2007) 饮食义动词“吃”带宾情况的历史考察,《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 熊金星、谢晓明 (2006) “吃”“喝”带宾现象的文化表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熊学亮 (2009) 论“吃”在“吃+NP”结构中的功能承载量和分辨率,《外语研究》第 5 期。
- 徐文红 (2001) “吃”+N 的特征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徐宜良 (2014) 饮食义动词“喝”的语义特征及其宾语语义类型探讨,《湖北社会科学》第 4 期。
- 徐中舒主编 (1995)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
- 雅洪托夫 (1969) 上古汉语的使动式,唐作藩、胡双宝选编《汉语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
-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
- 杨一姝 (2012) 汉语“吃”多义网络的认知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第 6 期。
- 姚庆保 (2002) 《左传》及物动词作使动用考察,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尹戴忠 (2011) 从饮食文化看“饮”、“吃”、“喝”的历史更替,《中州学刊》第 5 期。
- 张蔚虹 (2010) 《老乞大》诸版本饮食类动词比较,《汉语学报》第 3 期。
- 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史语所专刊。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9) ‘Eating’, ‘drinking’ and ‘smoking’: A generic verb and its semantics in Manambu. In John Newman (ed.), 91–108.
- Amberber, Mengistu (2009) Quirky alternations of transitivity: The case of ingestive predicates. In John Newman (ed.), 45–64.
- Bonvini, Emilio (2008) About “Eating” in a few Niger-Congo languages. In Martine Vanhove (ed.), 267–289.
- Boyardieu, Pascal (2008) From semantic change to polysemy: The cases of “meat/animal” and “drink”. In Martine Vanhove (ed.), 303–315.
- Caughley, Ross Charles (1982) *The syntax and morphology of the verb in Chepang*.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Croft, William (2008)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Demoz, Abraham (1964) The meaning of some derived verbal stems in Amharic. Ph.D. dissertation, UCLA.
- Dixon, R.M.W. (2000) A typology of causatives: Form, syntax and meaning. In R.M.W.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30–83. Cambridge:

CUP.

- Elbert, Samuel H. (1972) *Puluwat dictionar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Evans, Nicholas (2010) Semantic typology. In J. J. Song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504–533. Oxford: OUP.
- Family, Neiloufar (2008) Mapping semantic spaces: A constructionist account of the “light verb” eat in Persian. In Martine Vanhove (ed.), 139–161.
- Gouffé, Claude (1966) ‘Manger’ et ‘boire’ en haoussa. *Revue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3: 77–111.
- Guerssel, M. (1986) On Berber verbs of change: A study of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Lexicon project working papers* no. 9, Lexicon Project, Center for Cognitive Science, MIT.
- Haspelmath, Martin (1990) The grammaticization of passive morphology. *Studies in Language* 14: 25–72.
- Haspelmath, Martin (1994) Passive participles across languages. In Barbara Fox and Paul J. Hopper (eds.), *Voice: Form and function*, 151–17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énault, Christine (2008) Eating beyond certainties. In Martine Vanhove (ed.), 291–301.
- Hook, Peter Edwin & Prashant Pardeshi (2009)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EAT-expressions: Ways and byways. In John Newman (ed.), 153–172.
- Jaggar, Philip J. & Malami Buba (2009) Metaphorical extensions of ‘eat’ ⇒ [overcome] and ‘drink’ ⇒ [undergo] in Hąusa. In John Newman (ed.), 229–251.
- Koch, Peter (2001) Lexical typology from a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In M. Haspelmath et al.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v.1–2, 1142–1178.
- Koptjevskaja-Tamm, M. & M. Vanhove et al. (2007) Typological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11: 159–185.
- Koptjevskaja-Tamm, Maria (2008) Approaching lexical typology. In Martine Vanhove (ed.), 1–43.
- Koptjevskaja-Tamm, Maria (2012) New directions in lexical typology. *Linguistics* 50.3: 373–394.
- Lang, Adrienne (1975) *The semantics of classificatory verbs in Enga and other Papua New Guinea language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Lehrer, Adrienne (1992) A theory of vocabulary structure: Retrospectives and prospectives. In Manfred Pütz (ed.), *Thirty years of linguistic evolution: Studies in honor of René Dirve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243–256.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Næss, Åshild (2007) *Prototypical transi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æss, Åshild (2009) How transitive are eat and drink verbs? In John Newman (ed.), 27–44.
- Newman, John (1997) Eating and drinking as sources of metaphor in English. *Cuadernos de Filología Inglesa. Special volume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213–231.
- Newman, John (ed.) (2009) A cross-linguistic overview of ‘eat’ and ‘drink’. In John Newman (eds), 1–26.
- Newman, John (eds.) (2009) *The linguistics of eating and drink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ewman, John. & Daniel Aberra (2009) Amharic eat and drink verbs. In John Newman (ed.), 253–271.
- Pardeshi, Prashant et al. (2006) Toward a geotypology of EAT-expressions in languages of Asia: Visualizing areal patterns through WALS. *Gengo-Kenkyū* 130: 89–108.

- Rice, Sally (2009) Athapaskan eating and drinking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In John Newman (ed.), 109–152.
- Song, Jae Jung (2009) What (not) to eat: Metaphor and metonymy of eating and drinking in Korean. In John Newman (ed.), 195–228.
- Vanhove, Martine (2008) *From polysemy to semantic change: Towards a typology of lexical semantic associa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ierzbicka, Anna (2009) All people eat and drink: Does this mean that ‘eat’ and ‘drink’ are universal human concepts? In John Newman (ed.), 65–89.
- Williams, Kemp (1991) Radial structuring in the Hausa lexicon: A prototype analysis of Hausa ‘eat’ and ‘drink’. *Lingua* 85: 321–340.
- Yamaguchi, Toshiko (2009) Literal and figurative uses of Japanese: Eat and drink. In John Newman (ed.), 173–194.

A Lexical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Chinese *Eat* and *Drink* Verbs

Jia Yanzi Wu Fux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exical typ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xicaliz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eat* and *drink* concepts in Chinese, the polysemy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Chinese *eat* and *drink* verb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namely, onomasiology, semasiology and lexicon-grammar interaction. By means of a cross-languag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eat* and *drink* verbs, and probes into their univers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unique features.

Keywords lexical typology, Chinese *eat* and *drink* verbs, onomasiology, semasiology, lexicon-grammar interaction

作者简介

贾燕子,女,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和词汇语义学。[Email:jyzlyr@163.com]

吴福祥,男,安徽安庆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Email:wufuxiang100@126.com]